

母语教材研究

A Study of First Language Textbooks

洪宗礼
柳士镇 主编
倪文锦



FRA SAGA TIL CD / A-BOKA



Her er den første
del av den første
del av den første
del av den første
del av den første
del av den første
del av den første
del av den første

Norsk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母语教材研究 (8)

外国学者评述本国语文教材

主 编 洪宗礼
倪文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语教材研究. 8/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7-5343-8301-4

I. 母… II. ①洪…②柳…③倪… III. 母语-教材-研究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8163 号

- 书 名 母语教材研究(8)
主 编 洪宗礼 柳士镇 倪文锦
责任编辑 吉祖斌
装帧设计 张金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常熟市虞山高新园阳光大道 28 号(邮编 215557)
电 话 0512-52391383 52361778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总 印 张 306
总 字 数 5 816 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8301-4
定 价 700.00 元(共 10 卷)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母语教材研究》集中了国内外160余位专家、学者的智慧，研究中国百年和世界40多个国家及地区当代的母语课程教材（含全球8大语系26个语种），是迄今参与人数最多、研究范围最广、成果最为卓著的多卷本母语教材研究专著。该书为国家教育科学规划“九五”、“十五”重点课题的终结性成果和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的重点图书。

回顾与总结 卷一 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的演进

卷二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评析

卷三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评介

卷四 中国百年语文教科书课文选评

译评与借鉴 卷五 外国语文课程教材综合评介

卷六 外国语文课程标准译介

卷七 外国语文教材译介

卷八 外国学者评述本国语文教材

比较与创新 卷九 语文教材编制基本课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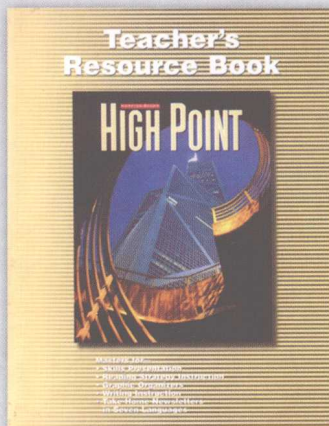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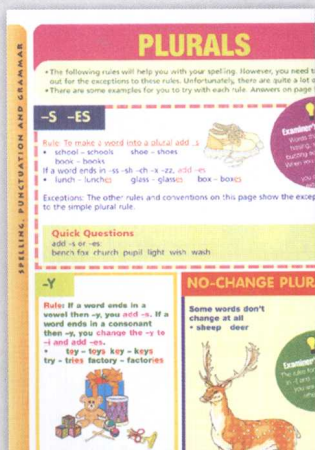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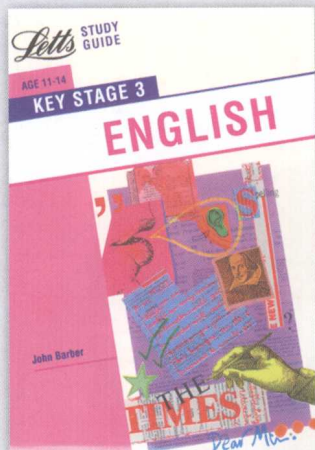
卷十 中外比较视野中的语文教材模式研究

顾明远 这一课题研究填补了我国语文教材研究中的空白，不仅丰富了教育科学研究宝库，也对我国当前课程改革起到借鉴、推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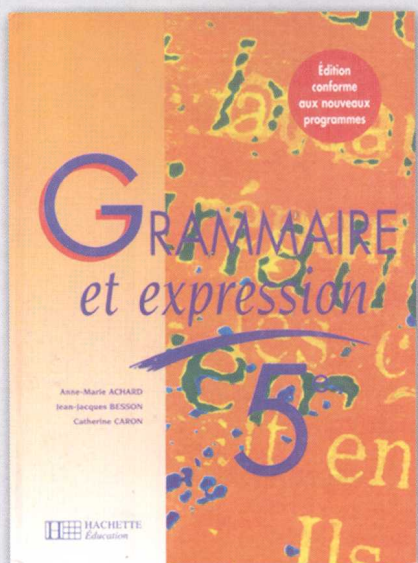
朱慕菊 这项课题拓宽了母语教育研究的视野，它的发展与创新，体现了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袁振国 这项研究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钟启泉 该课题研究既有广阔的国际教育的视野，又有本土改革实践的情怀，堪称21世纪初我国语文教育课程创新的奠基工程。



英国英语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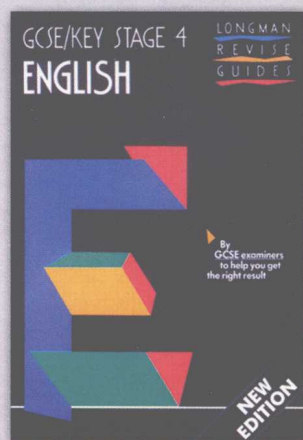
法国法语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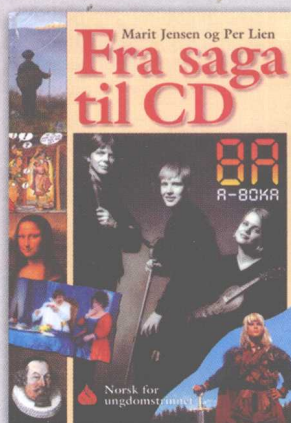
韩国韩语教科书



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



新加坡英语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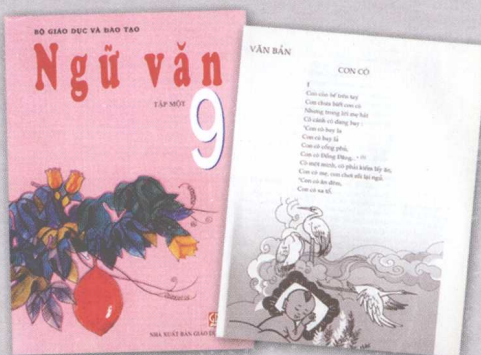
挪威挪威语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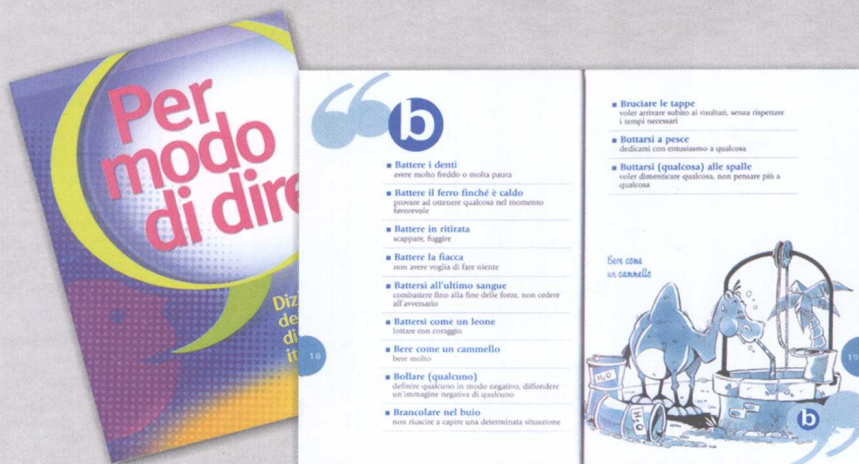
瑞典瑞典语教科书



瑞士法语教科书



越南越南语教科书



意大利意大利语教科书



英国巴斯大学李艳
(Valerie Pellatt) 教授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荣誉研
究员、日本国语教材审议会
会长飞田良文博士



法国古典文学博士贝娜黛特·根西
(Bernadette Guensi)



挪威奥斯陆大学弗洛耶迪丝·赫
兹伯格 (Froydis Hertzberg) 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托利尔·斯坦
因菲尔德 (Torill Steinfeld) 教授



挪威西福尔德大学达格伦·斯科
叶布莱德 (Dagrún Skjælbred) 教授

本卷导论

本卷的内容正如书名所揭示的那样,作者为外国学者,即该国对语文教育素有研究的专家,包括专业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学者、教育官员和长期从事教学而富有经验的语文教师;所评述的对象则是该国的语文教育,涉及语文教育的诸多方面。虽然不局限于谈教材,却为教材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

语文教育涉及的范围很广,包含语文教育环境、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和运用等方面,其核心部分是教材。因为教材是以文字为载体,它能够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和国家对于青少年语文学习的要求,以及不同的语文教育思想、流派、教学主张、教学方法更迭的轨迹;又由于它是纸质的,可以保存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直接现实性。从语文教材研究切入,结合一些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就不难了解某个国家、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的语文教育的情况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对众多国家的教育和课程教材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

本卷 30 位作者来自 15 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士、瑞典、挪威、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选择这 15 个国家,并邀请这些国家的专家学者对本国的语文教育进行评述,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这些国家或是现代语文教材建设起步较早;或是我国的周边国家,与我国的文化教育交流比较密切。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典、挪威等国,都是欧洲国家,它们的语文教育,从中世纪的贵族教育转变为现代的平民教育,可以溯源到几个世纪以前,在现代语文教材的编写、完善和运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和澳大利亚建国历史虽然并不悠久,但是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很快。在当今世界,这些国家的语文教育理论建设和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具有时代特点。

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在历史上,与我国的文化交流密切,彼此影响。这些国家的传统和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跟我国也有相近之处,

因而他们改革语文教育、编写语文教材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很有参考价值。

第二,这些国家的母语或通用语,在当今世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本卷所介绍的学者们论及的语文教材虽只有 15 个国家,却涉及 5 个语系,10 个语种。其母语教育影响广泛,历史悠久。

学者们在论述本国语文教材的特点、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途径时,常常溯本穷源,从语言、文学发展史、语文教育史、课程论和教材编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某种语文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形成和更替、语文教科书编写模式的形成和本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整体文化的关系。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探究语文教材编写的规律性。

二

对于外国语文教育的研究,除了实地考察和阅读有关资料之外,最为简便和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教材研究切入。而研究外国语文教材又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引进他国语文教材,由本国学者予以分析评价;一种是引进他国语文教材之后,再请该国的学者加以评述。前一种情况,在我国是常见的,或撰写专书、单篇论文予以评价,或翻译、选译原教科书,让读者接触、感受。这种做法,是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但有时会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国情,对为何采用这种思路来编写教材的原因缺乏了解,容易陷入片面性和表面性。因为一种语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文化系统,对于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底蕴并不了解或者知之不深,自然免不了隔膜。后一种情况,由外国学者来介绍他们国家的语文教材,由于他们生活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长期接受本国的文化熏陶,对本民族的母语教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比起局外人雾里看花当然要高明得多。

由外国学者来谈本国的语文教育,可以保持原汁原味,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外国教育的全貌和实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国学者谈本国语文教育有切身体验,评述往往切中腠理。由于作者是应邀专门为本书撰写的,他们能注意到彼此的文化差异,中国读者阅读起来,容易感到亲切。

本卷的执笔者中,不少是毕生从事其本国语文教育研究,享有国际声誉、卓有建树的专家。如《英国母语教学概述》的作者 Valerie Pellatt 博士,系英国巴斯大学教授、伦敦考试委员会中文部主任;《谈美国教材选用制度》的作者黄阮桂铭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教授;《美国高中语文教材评介》的作者格雷森·罗兰博士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部主任;《法国语文教材简述》的作者 Bernadette Guensi 系法国古典文学博士;《归于综合》的作者爱穆特·霍裴博士,系德国石荷州中学教学质

量开发研究院语文教师培训部主任、基尔大学客座教师(语言教学法专业方向)、德国日耳曼学者联合会德语分会会长;《挪威中小学“挪威语”教科书与教学评述》的作者托利尔·斯坦因菲尔德、达格伦·斯科叶布莱德、弗洛耶迪丝·赫兹伯格,分别为挪威奥斯陆大学挪威文学和母语教育教授、挪威西福尔德大学学院课程体系研究和母语教育教授、挪威奥斯陆大学母语教育教授;《新加坡英语教材——问题与策略》的作者 Phyllis Ghim-Lian Chew 博士,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为新加坡学校编写过语文教材;《日本现代国语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与回顾》的作者飞田良文,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原文部科学省教科书审定调查委员兼第一部(国语)主任委员、日本明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此外,本卷执笔者中,有的曾是政府教育官员,如《日本国语教材》的作者阿部诚,原系日本奈良市教育课长;还有一些是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如美国兰顿学校的谭大立、法国枫丹白露中学教师马利-奥德·德·朗让海根、日本奈良县立富雄高中国语部主任阿部千惠子等。

由国外语文教育研究人员、教育官员和资深语文教师三部分人来谈语文教育,呈现出不同身份的研究人员优势互补的态势。研究人员专门从事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在语文学科研究领域中具有高屋建瓴之势。教育官员有可能较广泛地接触各种类型的学校,能够在更大的范围里听到各个方面诸如社会各界、家长、教师、学生对于语文教育、语文教科书的反应,视野相对开阔。语文教师是教科书的使用者,他们能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之中体味到教材的长处与短处,学生的学习要求,语文教学应当如何改进,等等。

这三部分人从不同的视角去观照语文教材,营造了一个对话平台。我们可以就同样一个问题,看看不同国度、不同学术背景中的学者的想法,可以把问题思考得更全面一些,讨论得更深入一些。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说过:“在对话中,人们最初只是表达他们各自的固定立场,牢牢地维护自己的见解;随后他们意识到,维持群体的友谊氛围比固守自己的见解更重要。……由此而出现一种新的心态,这种心态立足于共同意义的建立和分享,而这种共同意义则在对话的过程中不断萌生和改造。这时候人们不再对立,但也不能说达到了彼此交互作用的地步:事实上他们参与并分享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共同意义之库。”^① 阅读本书,我们可以在学者们对话所产生的群体共同意义分享的效应中,感悟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语文教育所面临的带有共性的问题。

① 戴维·伯姆. 论对话.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1 页

现代社会本民族与他民族的语文教育有着共同之点。中国有个成语“殊途同归”，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不同地方，就相同或相近的问题进行探索，走过的道路和所使用的方法未必相同，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或相近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是相互验证的。

还应该说明，在本卷论文的执笔人之中，有的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他们既熟悉所介绍的国家的语文教材，也熟悉中国的语文教材，其中有的学者曾在中国长期接受华语教育，后来到他国从事英语教育工作，如美国兰顿学校的谭大立先生、新加坡教育署的陈雁如博士。有的是外国学者曾长期来华任教，对于中国的教育有着相当的了解，如日本的阿部诚先生。他们有的并非立意比较不同国度的语文教材或语文教学，但是因为自己的特定的双重文化身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进行比较，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比较含有主观色彩的价值判断，其实以他者的眼光来分析事物，会发现比习见者更多的东西，引出更多、更深入的思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具有两种文化背景的学者，进入他域教育圈，用自己习惯使用了的中国语文教材、习见了的中国语文教学状况、长期形成的中国气度与国外的同类事物相形相比，自然会有自己的发现，即使是再客观的、不动声色的介绍，也避免不了有比较的因素存在。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域的语文教材，只不过是透过作者的眼睛去看罢了。有的是具有中外教学经历的学者合作撰写的，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格雷森·罗兰博士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卡米尔伯克克高级中学美籍华人英语教师秦健合作的《美国高中语文教材评介》，一位是对于美国教材富有研究的教育专家，一位是在中国和美国长期从事英语教育的中学教师，他们分别从双重视角切入，找到了剖析美国高中语文教材的聚焦点，并对文本体系的内在结构予以了呈现和评价。

三

本卷众多学者就本国语文教育所作的评述，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本国语文教材编写和使用的背景。

各个国家语文教材的编写和使用的原则，有些是官方的规定，有些是潜规则，但是不管哪种情况，无不与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教育发展的情况有关。我们借鉴某国语文教材编写经验时，就一定要全盘考虑这种教材模式产生的背景（文化的、学术的），否则我们的借鉴就会变成盲目搬用，会给语文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比如英国只是由国家制定并颁行语文教学或考试大纲，不编统一的语文教科书，而由语文教师自己选用各出版社主持编写的教材。英联邦国家，如

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大多如此。为了保证学生的语文水平达到一定的要求,普遍推行语文的考级制度。正如 Valerie Pellatt 博士所介绍的那样,“大纲的设计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自信心、独立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有教师的工作在这个框架内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以保证在全国范围内教育标准的一致”;“在一级、二级和三级的结束阶段,每个学生由自己的老师作非正式的考核,再参加国家标准考核测试,这就是所谓的 SATS。在四级结束后,学生要参加国家统考,这也就是大家所知的 GCSE(初级中学证书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作为母语的英语教学,法令规定每一级都必须要考。”他们的“语文教学大纲”是为了便于教师掌握标准和便于学生准备参加考试而拟定的,对于各个年级语文学习所要达到的要求,规定得相当详尽。而有些国家已经通过编写好的语文教科书落实“语文教学大纲”或“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要求,各个年级的语文学习和检测要求就不必规定得太细。

又如语文知识的传授问题,要不要给学生以比较系统的语文知识,特别是语法知识和文学常识。印欧语系的国家都很重视语法知识的传授。因为印欧语系形态变化大,即使是本国人应用自己国家的母语,也要合乎规范,也必须系统地学习语法规则并且反复练习。法国在小学和初中进行系统的语法知识的传授和语法训练,德国“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了语文教学的三大任务范围:“阅读处理课文”、“对语言的思考”以及“读和写”。其中“对语言的思考”就是指对于语言体系、语言功能和语体的理解和把握。

再如教材的选择和分量问题。有的国家放得很开,课本种类多,分量重。法国中学语文课本数量繁多,有几百种,由各个学校自己决定采用适合自身教学特色的课本。开学前,同一所学校的法语教师会聚一堂,经过讨论确定自己学校要使用的语文课本。课文数量非常大,如初中二年级的课文多达 90 篇,课外读物 90 篇,初中四年级的精读和阅读课文合在一起有 160 多篇。内容繁多的课文,一方面为教师选择和灵活安排课程结构提供了展示个人才华的天地,另一方面也为学生阅读文学,了解多样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在理科的大学预科班,语文老师常常围绕一个文学主题组织学生学习和讨论,如果要分析“英雄主义”,老师可以要求学生阅读 3 部作品(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并结合作品对主题进行归纳和分析。阅读课文的选材偏重于经典文学作品,实用文体的文章几乎没有。法国语文教材的这种趋向是和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紧密联系着的,法国是文学大国,又是哲学大国,强调个性解放,注重感情底蕴的积累和发抒,重视思辨。

这些学者的介绍,犹如引领我们到某个风景点赏景,有了一本很好的旅游指南,或者有一个很好的向导,避免走弯路,也能更好地领略到景物之美。

其二,本国语文教材编写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本卷主要是横向介绍各国语文教育现状,并非是各国语文教材的发展史。但不少作者在评介本国语文教材时,兼及历史的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为所要评述的语文教材定位。日本飞田良文教授的《日本现代国语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与回顾》,综述了由最早的统一国语时期到二战以来采用美国的经验主义教育观,强调了语言的社会功能。引进了“核心课程”思想,把社会课作为中心课程,国语课作为其外围课程,削弱了语文作为独立学科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直到反思之后,才采用“综合型单元”的模式编写教材。

俄罗斯 B. Л. 杨琴科教授在《论 20—21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中小学教材内容改革》一文中,介绍了前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改革、90 年代初的重大历史事件乃至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中小学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教材以及其他学科教材内容改革的问题。她指出:俄罗斯语文教育正走向人性化和科学化。目前,俄罗斯语文教材的运用,正从高度统一逐渐转化为可由教师选择,从机械训练、刻板的知识传授转化为强调学生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感悟。

新加坡 Phyllis Ghim-Lian Chew 博士的《新加坡英语教材——问题与策略》一文,分析了新加坡官方语之一的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使用的各种英语教材的不同侧重点和针对性,指出各个时期的英语教材都具有创新性,而这种创新是与以前的课本比较而言的,促成这种创新变化的因素是语言学的发展和语言教学的实际需要。

其三,语文教材编写原则的探究。

语文教材编写的原则是由该学科的教学目标和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有的学者认为目前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愈来愈繁,任务也愈来愈重。德国爱穆特·霍裴博士指出,德国近 50 年来语文目标的描述愈来愈复杂,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广义文学”概念,各种实用文体的文章统统进入课堂。语文课上必须传授被学术界认定为“可靠的”语法模式,许多新的语法概念进入了教材和大纲。新的“语文教学大纲”还要求传授科学的学习方法,如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处理,要求学生既能从文章内部的各个层面进行分析,又能从社会学、心理学、作家生平各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在教材内容方面,还把“参加文学活动和文化活动”作为语文课的学习内容,强调语文教育的实践性。他认为:“教材设计——至少从科目(即语文)内部来看——归于综合,文学与语言的综合,任务范围与任务范围之间的跨范围性综合。”韩国教师朴姬淑、朴衡佑,也指出本国语文教材内容泛化的倾向,认为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应该相对单纯化,不能承担其他学科的教学任务。

有的学者还介绍了语文学科是怎样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学习以适应现

代社会需要的。赵立新的《瑞典基础教育课程及母语教育》，介绍了瑞典语 A 的教学目标规定，要求“能够从图书馆和数据库中获得信息知识，对此作出评价，形成自己的观点，能够用计算机写作和交流”，把语文课和信息课程结合起来了。在教材中专章介绍了“我们邻居的语言”（挪威语、丹麦语、冰岛语）的有关知识、媒体和新闻的有关知识。在教材 Speglingar（“影子”）中除了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史之外，还介绍了欧洲之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格雷森·罗兰博士撰写的《美国高中语文教材评介》，也介绍了美国在英语课本中指导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资料检索的方法，在教材内容中介绍了中国和其他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知识。

其四，语文教材编写的模型——呈现方式的探究。

语文教材的编写模型，是受语文教育思想以及体现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性文件如语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制约的，是属于形式范畴的。内容决定形式，语文教材编写模型的改进和重新选择是必然趋势。

飞田良文教授谈及，二战以后，“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广泛地渗入到日本的教育制度、目标、内容及方法各方面，通过《学习指导纲要》进行普及。教科书也按照《学习指导纲要》的要求来编写”。在 1954 年以前，主要是受了“语言生活实际”的经验主义国语教育观的影响，国语课本采用了按学生的日常生活编制课文单元。1955 年《学习指导纲要》强调了国语课要培养“个人成长所需的语言能力”，转向了“能力主义”，国语教科书的编写模型也就变为了“同类型文章为单元的‘综合型单元’”的编写模式。

范德忠博士在《越南初中母语教科书〈语文〉(Ngữ văn)评介》中，介绍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越南的初中母语教育课程。该课程包括三分科：文学、越语、写作。这些科目分别编写了教材。经过了 10 多年的实践以后，发现“这种结合结构注重理论系统的科学性，而对综合实践运用不是很有利，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而学习效果不是很理想”。1998 年，越南教育培训部推行“发展初中教育计划”，开展教育改革，经过 5 年试验和整理，编写出一套“综合结构”的越南《语文》课本，“把文学、越语、写作三部分拼成一个主体”，从分科型走向了综合型。

其五，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审定、发行和使用的制度及潜规则。

不少国家语文教材编写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在于商业竞争。为了争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出版商加大了教科书编写的资本投入，从而促使了语文教材的多样化。各个国家如何在国家教育部门的指导之下，发挥社会力量完善教材，都有一些好经验。

审定制度虽并非所有国家都采用，但是任何国家编写教材都有一定的依据——语文教学大纲、语文课程标准或其他文件。实行审定制的国家，如日本等，编好的语文教材经政府有关教育部门审定通过以后才能使用。审定是

限制,但是对于教科书的完善和质量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语文课本的使用,教师选择权利的大小,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内部都有些不同。教师是教材的使用者,对于教材的长处、短处、改进的途径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赋予教师以完全的或较大的教材使用权,将有利于教材编写的竞争和进步。但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由于涉及统一考试,常常是一个州或一个地区要选同一种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无形之中受到了限制。

四

《外国学者评述本国语文教材》在语文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上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第一,语文教学研究要有广阔的视野,不能就事论事,要从点中见面,把自己所研究的局部,放在时代和历史的层面上来考察。

外国学者评述本国语文教育,有的虽然只是研究一种教材,甚至某一年级、某册教材,但是笔者视野开阔,能够从历史的发展和具体的教材使用中,来看待某个局部的价值,题目小而切入深。例如《简谈高中法语教材〈文学〉》介绍了法国一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高中语文教材。文章分析了这套教材的长处,指出课本除了选材丰富、精当以外,还配有大量导读、引言、综合评价,帮助学生理解作品。对每个世纪都有一个较长的历史导论,将作品置于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学生从中可以发现,作品不是独立于时代的,而是处于一个历史、文化和社会学影响的网络中。练习大多采用提问式,让学生主动思考,自己去发现概念含义并作出综合理解,而不是用理论课的形式强加于学生。文章把教材的构成方式和语文教学大纲、会考要求以及本国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谈,让我们不止于了解这套教材,也了解了法国语文教学的一些状况,了解了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教材编写的。

第二,语文教学研究必须保持探究与创新的精神。

语文教材往往要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社会各方面情况如果发生变化,对语文教学就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教材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应当与语文学科的特点相适应。比如语文教育应该承担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任务,应该承担更好地接受和传播信息的任务。但它不同于伦理课,不同于计算机课,不同于信息课。《韩国第7次教育课程中学国语教科书中的教育理念研究》一文,对于教科书的选材原则提出了质疑:1999年韩国国家教育部指定的教科书编写在选材内容方面提出,应包括民主市民教育、人格教育、环境教育、经济教育、能源教育、勤奋精神修养教育、保健教育、安全教育、性教育、消费者教育、出路教育、统一教育、民族文化教育、国际化教育、